

互蚀的招呼：关系本体论视角下的建筑创新困境

本文从一个被惯常解释遮蔽的裂口出发，追问事情究竟如何发生。

作者 葡萄 · 约 2.4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建筑学正处在一个奇特的困局之中：跨学科对话、公众参与和技术协作的密度与日俱增，然而，那种能够撼动既有认知格局、开辟全新道路的建筑作品，却变得愈发罕见。本文拒绝将这一困局简单地诊断为“创造力被压制”或“创新被收编”，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更深层的关系本体论事件。通过系统性地辨识并穿透既有批判理论的共同预设——即将创造者设想为一个先在的、自足的能量实体，其能量随后被外部机制所消耗或转移——本文将分析的重心从“能量的命运”移向了“关系本身的生成性”。本文提出并论证一个名为“互蚀的招呼”的新概念，用以命名如下过程：真正的建筑创造，并非一个先在的、自足的主体向世界输出其内在构想，而是主体在向一个携带着抵抗与未知的“本真他者”——一片陡峭的场地、一种陌生的工艺、一群无法被既有规范语言描述的使用者——发出探索性呼唤时，被他者独特的回响所反向塑形的双向激发过程。然而，当代建筑的评价与协作系统，正以一套由规范、效率与既有审美构成的、可被完全预判的绩效符号，系统性地替换掉那个活的、会抵抗的本真他者，将其降格为驯化的系统性他者或纯粹的赝品。这导致“招呼—回呼”的生成回路断裂，创造冲动并非被消耗，而是在一个充斥着“正确回应”的独白回音壁里，因其共构的他者缺席而丧失了被反向激发生成的条件。本文通过对“再生砖”方案的深化重演、个体经验的现象学描述、系统机制的微观解剖，全程演示了“互蚀的招呼”的运作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可操作的识别路径与明确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互蚀的招呼；建筑创新；本真他者；关系本体论；发生学

一、一种无法被归类的困境

我们正身处一个建筑学对话空前繁盛的时代。社会学家被邀请来解读空间中的行为模式，生态学家为每一块玻璃选型计算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计算机科学家将设计任务拆解为可被算法优化的参数网络。公众参与被认真地写入设计任务书，社区工作坊、线上意见征询和方案比选投票，构成了每个大型项目启动前的标准程序。与此同时，数字平台让文档迭代、版本比对和多团队协作变得极度透明和高效。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业综合体，从概念方案到施工图完成，可能伴随着上千封往来邮件、数百次会议纪要和无数轮各方意见的“闭合”。在协作与沟通的意义上，我们从未如此勤勉。

然而，在所有这些交互的汹涌潮汐退去之后，一种深刻的沉默却从建筑的物质实体中浮现出来。在那些被无数轮专业对话反复磨洗过的建筑里，你很难再感知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强韧的主体意志。这里说的意志，不是指建筑师个人化的任性或傲慢，而是那种只有在真诚地面对一个巨大的、外在于自身知识边界的难题——一片无法用任何现成类型学归类的陡峭坡地，一种其物理逻辑会反过来教导建造者的陌生材料，一群其生活世界与价值序列与设计者完全断裂的使用者——之后，被这个难题逼出超乎自己预料的解答时，才会留下的独特印记。你看不到设计者在与一种活的、会抵抗的现实剧烈摩擦后留下的搏斗痕迹。你能看到的，是一种圆熟的、“经得起各方询问”的平滑。这些建筑回应了所有人的浅层诉求——甲方要的业态匹配了，规范组要的疏散宽度满足了，评论家偏好的美学标签贴上了——但它们却未曾向任何一个深度的、携带着抵抗与未知的“异质性他者”，发出过全力以赴的呼唤。

这里发生的，不是一个“外界阻力太大，导致创新被压制”的故事。恰恰相反，这里发生的是一个更为隐蔽也更为根本的事件：交互过于顺利，以至于真正的、能够重塑创造主体的那种激荡性相遇，从未发生。当所有的他者——甲方代表、审查专家、潜在用户、评论界——都学会用一套被完全预判的绩效语言（成本区间、周期节点、规范条文、流量数据、美学品类）来表达自己时，设计者实际上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个能真正抵抗他、因而也能深刻地改变他的存在。他以为自己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对话，其实，他只是用一套高度专业化的符号系统，与另一套同样被符号化、因而也完全可预期的需求系统，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流畅的信息交换。他的创造冲动——那个本应在与顽固现实的激烈碰撞中被反向点燃的、鲜活的生命力——因为找不到一个能真正“回呼”他、挑战他、逼他挣脱旧壳的对手，而在一场盛大的、技术性完美的独白中，渐渐失去了自己发声的能力。

对于这一困境，建筑学内部并非没有诊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几支论述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是“体制说”，将问题归咎于规划审批的僵化、规范条文的过细和行政干预的随意。其二是“市场说”，指向开发资本对短期回报的追逐、对风险的本能回避以及“标准化产品”的路径依赖。其三是“教育说”，批评学院教育的知识体系与当下实践脱节，未能培养出有能力在复杂条件下做出综合判断的设计者。其四是“技术说”，忧虑参数化设计、BIM和其他数字化工具的普及，正在将设计过程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主导的优化作业，挤压了直觉与判断的空间。

这些诊断各自捕捉到了困境的某个真实切片，因此在业界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然而，它们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它们都将创造者——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建筑师，还是作为整体的设计团队——设想为一个先在的、自洽的主体，这个主体携带着某种确定的创造力，只是被外部的恶劣环境（体制、市场、教育或技术）所压制、扭曲或消耗。困境被理解为一种“健康的创造主体”与“有病的环境”之间的冲突，而出路则相应地指向“为创造主体松绑”、“保护创造空间”或“恢复创造初心”。

本文的判断与此根本不同。本文并非否认体制、市场、教育和技术等因素的真实影响，而是认为，上述诊断所共享的那个预设本身，正是需要被追问的对象。我们所笼统地称之为“创造冲动”的那个东西，并非一个先在的、等待着被释放或压制的能量体。它是一个只有在特定关系中才能被当下构成（或阻止构成）的事件。因此，当代建筑创新真正的困境，其内核不是“能量的命运”——一个已经存在的创造主体被如何对待——而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发生学问题：这个创造主体本身，正在失去其得以构成的那些根本性关系。本文的目标，便是去追问：当创造者无法从他所面对的世界那里，获得那种足以击穿其既有认知图式、逼使其重新组织感知与判断的真实回响时，构成他创造力的那个根本性关系本身，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关系本体论的透镜：他者、招呼与回呼

要在“能量经济学”的既有战场上开辟出“关系发生学”的新领域，首先必须装配一套能够精确地捕捉、描述和分析那些构成创造力的根本性关系的概念工具。本节依次界定三个核心概念：他者、招呼与回呼，并在此基础上将它们组装成一个统一的发生学透镜。

他者。在日常语言中，“他者”往往被宽泛地理解为“其他人”。然而，在本文的理论构架中，这一概念有其严格的现象学来源与特定的操作性定义。它借自列维纳斯以降的法国现象学传统，特指那些携带着无法被“我”已有的知识范畴、语言习惯和评价标准所消化、所收编的绝对外在性。他者之所以为他者，不在于其物理上的不同，而在于其根本性的抵抗——他不轻易回应“我”的呼唤，或者，他以一种让“我”措手不及、颠覆“我”预判的方式来回应“我”。正是这种抵抗的冲击，迫使我挣脱自己那套已然自洽却日渐封闭的认知—操作惯性，发生真正的结构性变形。

然而，必须立即对列维纳斯做出两点关键补充。第一，在列维纳斯那里，他者以其面容向我发出无限的伦理召唤，此召唤是单向的，它先于我的一切主动性，并将我建构为一个被动的、不可推卸的回应者。这个框架深刻地描述了我与他者的原初伦理关系，但它并未处理另一件在具体创造性实践中同样根本的事：主体并非仅仅被动地聆听召唤；主体同时也在主动地、试探性地向他者发出邀请与征询。第二，在真实的建筑实践中，他者并不是一个哲学抽象的独一面容。它会以两种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形态现身，而准确地区分它们，是本文全部诊断的基石。

本文据此提出一对关键区分：本真他者（the Authentic Other）与系统性他者（the Systemic Other）。本真他者，就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绝对外在性在具体建筑经验中的显现——一片其复杂地

质与微气候无法被任何现成场地分析公式穷尽的基地；一种其力学行为、工艺传统和老化痕迹会反过来教导建造者的陌生材料；一群其日常生活节奏、价值排序与空间感知方式，构成了一套与建筑师现代生活经验全然断裂的意义系统的住民。本真他者的核心标志在于：它所发出的信息，携带着无法被“我”的既有专业语言完全翻译和消化的异质性。与本真他者相遇，设计师会感到一种根植于认知深处的“棘手”——不是行政压力，不是成本约束，而是一种自己的整个理解框架在被某种坚固的外部现实轻轻摇撼的感觉。

系统性他者则不同。它同样在设计协作系统中占据一个真实的位置——结构总工、消防顾问、甲方成本代表、政府规划审批人员——这些角色本身所携带的专业视角、制度权限与职业责任，都是真实的，绝非虚构的“反派”。他们的工作对于任何一栋建筑的安全、合理和可实施而言不可或缺。然而，由于他们所嵌入的评价体系（规范条文、成本标准、周期考核）已经高度符码化，他们在履行其专业角色时，所能够使用的语言和所被授权做出的判断，几乎被完全限制在了一套可预判的绩效符号之内。因此，系统性他者向设计者发出的信息，在性质上与本真他者的“回呼”有着根本差异。本真他者的信息会超出设计者的认知预期——它让后者“愣一下”、“卡住”、“感到被挑战”。而系统性他者的信息，尽管在内容上可能有赞同或反对、建议或否决之分，但在形式上却总是已经被纳入设计者可以事先预判的认知框架之内。设计师在去见结构总工之前，就大致知道他会问什么；在去见成本代表之前，就大致知道他会说什么。这种完全的“可预判性”，恰恰就是系统性他者的标志。

这一区分一旦确立，一个更严重的可能性便浮现出来：在当代建筑生产的实际运转中，本真他者并非总是缺席——一片陡峭的坡地依然陡峭，一群陌生的使用者依然陌生——问题在于，协作系统正在用一种高度有效的方式，用系统性他者替换掉本真他者。当建筑师试图向一片真实的场地发出招呼时，他所接到的不再是场地通过其微气候与地质逻辑做出的抵抗性回响，而是规范顾问和成本顾问用绩效语言转译过的“场地条件的工程摘要”与“场地开发的经济评估”。本真他者并没有消失，但它在进入设计对话的第一刹，就被一层密不透风的系统性中介所覆盖。建筑师此后面对的，始终是那个中介——一个可用既有专业语言完全解码、因而再也不会让他措手不及的驯化的赝品。

招呼与回呼。正是为了命名那个将主体与本真他者联结在一起、并在联结中双向激发创造冲动的根本性关系，本文在此提出一对新的概念：招呼（call forth）与回呼（call back）。招呼，是主体向本真他者发出的一次试探性的、朝向未知的抵达。它不是对任务指令的发布，而是一种姿态性的邀请：“你是否愿意以你全部的异质性，来撞击我已有的秩序？”回呼，则是本真他者以其独特的抵抗、沉默或不期而至的馈赠，对此招呼做出的反向激发。它迫使主体挣脱旧壳，重新组织其感知、判断与表达。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招呼并非列维纳斯伦理学中那个被动的“回应”（response to the Other's call）。列维纳斯的回应是单向的——我被他者召唤，我无可推卸地应答。而本文的“招呼—回呼”则是一个双向的生成回路：主体主动发出招呼，本真他者以回呼反向激发主体，主体在被激发后修正其召

呼，本真他者再以新的回呼做出回应——如此往复。创造冲动，正是在这一回路的每一次张拉与松弛、每一次阻断与重启中，被从主体与他者的交界处反向逼出，而非从主体内部单向流出。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坚持认为，创造冲动不是先在的能量，而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物。

至此，本文的核心概念已经装配完毕。带着这副重新校准过的透镜，我们再去看那些已经存在于学术场域中的、在逻辑形态上最接近本文议题的批判理论，便能清晰地辨认出它们共有的那个未经审查的“单主体”预设，以及这一预设所必然带来的分析性盲区——它们无一例外地将创造者设想为一个先在的、自足的能量实体，其能量随后被外部机制所“收编”、“卸载”、“误伤”或“约束”。本文的诊断则在根本上与此分野：我们称之为“创造冲动”的那个东西，是只有在主体与一个本真他者之间双向的、充满对抗的“招呼—回呼”关系中，才能被当下构成的事件。一旦这个生成回路被阻断或替换，主体不仅失去了创造的成果，更在根源处失去了创造的能力本身。

三、二阶碰撞：为何必须越过“能量经济学”

一个新概念的合法性，不在其修辞的新颖，而在于它是否成功划定了一道既有理论网络所无法切分的辨别面。本节的任务，就是让本文提出的“互蚀的招呼”，去正面撞击四个在逻辑形态上最接近、因而也最可能替代它的批判理论。这一碰撞的目的，不是在它们旁边再摆上一个新的分类标签——“你们是能量经济学，我是关系发生学”——而是要找到那条这四个理论即使在它们的并集里也够不到的分离线。如果找不到，那么“互蚀的招呼”就只是一个漂亮的新名字；如果找到了，它才是一根不可还原的骨。

回收（*récupération*）。Boltanski与Chiapello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揭示了一个深刻机制：当代资本主义系统能够通过主动吸纳对它的批评——例如，将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渴望，回收为项目管理中的“弹性工作制”和“扁平化组织”话术——来重新为自身的正当性奠基。在这个模型中，动力是清晰的：有一份外部的、先在的异议能量，被系统识别、驯化并加以利用。反对的能量越强，系统回收后就越巩固。但在本文所面对的经验中，问题的要害不在“异议被回收”，而在于那足以构成异议或创造源泉的原初异质体验，在其萌发之初就从未被充分生成。当建筑师从一开始就面对已经被绩效语言严密编码的他者时，他从哪里去获得一个能抵抗他、从而让他由此生发出批判意识的立足点？回收理论的叙述起点——一个已然存在的、携带着替代性价值构想的批判者——恰好是本文需要追问其何以缺席的那个项。“互蚀的招呼”要诊断的，不是能量的循环利用，而是能量的生成短路。

压抑性去升华（*repressive desublimation*）。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描绘了技术理性如何通过提供大量廉价、直接的满足，来“卸载”本可驱动社会批判与超越性艺术创造的力比多能量。这个模型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高度舒适的社会里，真正的反抗反而会消融。但它同样预设有一份先在的能量（力比多）有待被压抑、转移或释放。在本文的诊断中，青年建筑师所

体验到的，并非欲望被廉价满足所稀释的那种慵懒的舒适——他并不舒适，他焦虑且枯竭。他不是被娱乐和消费所麻痹，而是在他每一次试图向外部世界发出严肃的专业追问时，遭遇到一个“无回响的空洞”。他试图向他者发出招呼，但那个他者已经被替换成只会发出可预判绩效信号的赝品，无法以任何真正出人意料的抵抗来回呼他。这不是“压抑性的去升华”——那是欲望的河道被改流，而本文要描述的是：河流在源头处失去了与其水源地的连通。能量所指向的那个关系性对象消失了。

自体免疫（autoimmunity）。这是四个对手中最强大、最接近本文诊断的一个。埃斯波西托以免疫学为模型，描绘了一种悲剧性病理：一个系统为了保护自身，将自身的一部分误认为“非己”的威胁而加以攻击和摧毁。这一范式已经触及了“系统内部机制杀死自身”这个结构，比回收或去升华更接近本文所说的“互蚀”。它不需要一个外部的反派——破坏恰恰来自系统自身的保护性逻辑。然而，本文的诊断在此基础上要再推一步。埃斯波西托的autoimmunity模型仍然顽固地预设了一个可以被明确辨识的“自身”（self）——无论是个体肉身还是社会体。破坏的机制是“误认”——自身内部某一部分被错误地标记为威胁。但本文所要诊断的情形更为吊诡：在当前的建筑创新系统里，那个“创造性的自身”并非被免疫系统误杀，而是它从未在与本真他者的对抗性遭遇中被充分地构成过。一个建筑师或一个设计团队的创造性“自身”，并非一个生理上的既定事实，而是一个只有在与异质他者的招呼关系中才能逐渐成形、巩固和更新的意义结构。当他者被赝品替换，他/她面对的就始终是一个无菌的回音室。在此回音室里，没有一个携带异质性的对手能逼他/她辨清自己的边界、确认自己的信念、并在抵抗中淬炼自己的表达。“自身”因此始终停留在一个模糊、饥饿、无法凝聚的状态。这不是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人，而是整个躯体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其免疫能力——即与异质性相遇、经历风险、并因此变得更强的能力——因长期缺乏真正的抗原刺激而从根源上萎缩了。

此刻，我们可以找到autoimmunity与“互蚀的招呼”之间的那一条分离线了。将autoimmunity的核心变量抽取出来：它是“系统错误地将自身的一部分识别为威胁并进行攻击”。追踪这个变量，autoimmunity的诊断建议是：恢复免疫系统的正常识别功能，让它不再错杀自身。而“互蚀的招呼”追踪的变量则是：“系统是否仍在主动地与携带着不可化约之异质性的本真他者发生对抗性遭遇，并在此遭遇中持续地重构自身”。这两个变量在常态下高度相关——一个持续遭遇他者的系统，其免疫识别功能往往是健康的；一个被无菌环境隔离的系统，其免疫识别功能往往出错。但它们是可分离的。分离点在此：一个系统可以拥有完全正常的免疫识别功能，从未误杀自身，却依然因为长期处于一个由驯化的赝品他者构成的“无菌”回音室中，而丧失了与异质性相遇并在此相遇中发生结构性变形的能力——因为，在那种条件下，那个需要被变形的“自身”，从一开始就未曾被充分地构成过。这不是“错杀”的问题，这是“始终未能彻底出生”的问题。

相应地，一条可以区分两者的可裁决预测线浮现出来：一个系统刻意地、制度化地引入强烈的本真他者刺激，主动让自身暴露在认知不适的风险之下——这个动作，在autoimmunity模型中被视为自毁行为，应为免疫系统所阻止；但在“互蚀的招呼”模型中，这个动作恰恰是维持创造主体不被

锈死的必需操作。本文第七节将要讨论的皮亚诺工作室“受保护的实验期”，正是一个例子——它不是“保护自身免受攻击”（autoimmunity的纠正方案），而是“在组织内部制度化地、可控地制造本真他者的刺激，以维持招呼回路的活性”。这个动作的方向性——是防御性的自我保全，还是主动性的自我暴露——正是autoimmunity的框架所无法解释的。它在autoimmunity的视野中要么被读作系统故障，要么被当作非理性的风险偏好；而在“互蚀的招呼”中，这个动作恰恰是维系创造性“自身”不被锈死的发生学条件。这便是“互蚀的招呼”切开的、autoimmunity（及其余三个理论）够不到的辨别面。

创新者的窘境（innovator's dilemma）。克里斯坦森的经典理论精确地指出了已确立的企业如何因过度倾听其主流客户的需求、专注于优化其既有价值网络内的产品，而错失来自边缘市场的颠覆性技术。此处的预设同样一目了然：那项颠覆性技术作为一种“存在之物”已经诞生，只是被领先企业的资源配置逻辑挡在了市场之外。本文要将追问再往前推进一步：在被既有价值网络——“深化是否可行”、“规范是否有先例可循”、“市场报告是否支持”——完全捕获的对话生态里，那项建筑方案或设计理念的最初形态本身，是否还能被充分地孕育出来？当一位建筑师从现实（那个最大的他者）中接收到的所有反馈，都以现有规范的“可/否”逻辑和成本顾问的“贵/贱”逻辑来表达时，他如何能捕获那些尚无法被任何现行价值语言所描述的、来自未来的微弱信号？克里斯坦森解释了“一家好公司为什么会被颠覆”；本文要解释的是，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为什么连颠覆者的草图都越来越难画出来了”。

综上所述，“互蚀的招呼”与这四组经典论述的分野已经清晰可辨。它不试图在“能量经济学”的既有战场上添加新的变量，而是发动了一场向“关系发生学”的领域转移。它的核心判断因此是：当代建筑创造力的困境，其内核并非一个先在的创造主体被外部制度消耗或压制，而是在于，与主体共构创造冲动的那个本真他者，被一套完全可预判的绩效符号所构成的系统性他者替换，导致那个双向的、只有在抵抗中才能生成创造力的“招呼—回呼”回路发生断裂。创造冲动，最终在一个充满礼貌回应的交互迷宫里，因其共构的他者的缺席而逐渐枯萎。这不是一个关于“力量”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关系”的故事。

四、当他者被替换：“再生砖”的发生学重演

理论的骨架，必须被具体案例的血肉所充盈。本节将以2008年汶川地震后建筑师刘家琨的“再生砖”方案为对象，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发生学重演。不同于通常将该方案作为“低技策略”或“社会参与”范本的解读，本文的重演将聚焦于一个核心进程：在方案萌发与推进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它所招呼的那个本真他者，是如何被三套更强大、更安全、也更可被既有专业话语接管的系统性他者替换，从而导致那个本应将建筑师、灾民与物质废墟三方都推入未知领域的“招呼—回呼”回路，被短路为几段各自独白的安全旋律。本节的重演基于刘家琨本人公开发表的项目自述以及相关建筑评论的文本分析。对于文本无法直接证实的互动环节，本文将以审慎的理论重建方式呈现，并明确标明其推演性质，以便读者区分“有文本依据的事实”与“基于理论逻辑的推断”。

根据刘家琨在《“再生砖”计划》中的自述，方案的起点确实存在一个强烈的、复合的行动冲动：地震之后，遍地的建筑废墟不仅是需要清运的垃圾，更构成了灾民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创伤记忆。建筑师在此处发现了一个机会——提供一种将废墟材料（碎砖瓦、秸秆）压制成新型砌块的简易技术规程和手动模具，让灾民得以亲手将砸碎自己家园的废墟，重铸为建设新家园的砖块。刘家琨明确写道，他希望“灾民能够自己动手把废墟做成砖，用在自己重建的房子上”——在这个表述中，灾民不仅是被救助的对象，更是建造的主体。这个设计设想的深层结构，不是向一个抽象的“使用者”提供一堵墙，而是向一个具体的、被灾难抛出了正常生活轨道的行动者发出了一份存在论意义上的邀请。这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一份招呼：它召唤一个需要亲手将自己从“被灾难摧毁的受难者”，重新制作为“有能力建造的能动者”的灾民——成为这个方案的共同作者。

这个被招呼的“灾民建造者”，正是携带着不可化约的异质性的本真他者。他的需求不只是一项待满足的物理指标，而是一种无法被任何灾后需求评估表触及的深层状态：在摧毁他世界的同一片废墟上，用自己身体的劳作，恢复他作为意义世界建造者的主体感。这个他者的“抵抗性”，恰恰体现为他必然的不标准、不高效和不听话——他会压出强度不均的砖块，他的施工速度无法与预制板的吊装竞争，他那因陋就简的美学处理可能让建筑师感到不适。然而，正是这些抵抗，这些“不配合”，预设着一份对建筑师的深刻回呼。它们会倒逼建筑师去发明新的节点构造、新的施工组织流程、新的与使用者共商共建的沟通工法，从而将“再生”从一个浪漫的比喻，逼成一个切实咬合着具体物质、社会和心理现实的、在摩擦中持续演化的建造系统。

然而，当“再生砖”从刘家琨的个人设计行为，进入由专业评论界、工程规范体系和政府重建管理机制共同构成的协作网络时，上述那个活的、本真他者性的招呼，被相继替换了。值得注意的是，下述替换并非在一场面对面的对抗中发生，而是在一个分散的、多线程的、各行动者各自独立决策的场域中，通过一种“语言转译—问题闭合”的微观机制，逐步完成的。

第一位施行替换的，是审美领域的评论话语。当“再生砖”首次在建筑专业媒体上获得严肃关注时，它迅速被一群善意的评论家识别并纳入“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美学叙事框架。它被表述为一种融

合了“低技”、“在地性”、“废墟美学”与“手工痕迹”的“新乡土”风格，并与当时国际上关于“社会性建筑”的讨论产生了共振。这个操作，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对他者的第一次替换：它将建筑师意图与之艰难对话的那个、携带着存在论重负的“灾民建造者”，无缝地转译为一个在既有建筑学知识图谱中完全可读、可归类、可被安全赞赏的美学符号系统内的角色——一个等待着审美鉴赏力去确认其价值的“乡土风格案例”。评论家所使用的语言，是由“风格”、“手法”、“形式语言”、“地域主义谱系”等范畴构成的。这些范畴能够精致地讨论砖墙表面的粗糙肌理如何回应了废墟的诗意，却天然地无法感知那片废墟所承载的、一个普通人试图通过亲手劳作来缝合自身存在性创伤的挣扎。

非但如此，这一操作——学者们在论述“再生砖”的“美学价值”、“社会关怀”和“文化意义”时所进行的学术工作——本身是高质量的。它甚至为方案赢得了更多的专业声誉与媒体关注。然而，正是在这些善意而精致的专业判断运作中，评论话语充当了一个高效的“转译器”：它将“灾民建造者的抵抗性回呼”这个建筑师尚未充分听见、带着泥土与不确定性的真实信号，转译成了“废墟美学”和“批判地域主义谱系特征”这两个干净的、可被建筑学语言安全消化的美学范畴。评论界没有用“再生砖”来拷问学科既有标准的边界；它反过来，用既有标准的宽容度，将“再生砖”安全地收纳进了学科的既有叙事。招呼的回路，在进入专业讨论的第一刹，就被一套高效的、只回应“美学价值”的话语系统所屏蔽和替换。

第二位施行替换的，是工程领域的规范体系。当方案需要从示范性的几间农宅，走向灾后大规模重建的严峻现实时，结构工程师、消防审核人、项目管理者围绕着“长期抗震性能”、“冻融循环下的耐久性”、“批次间强度的一致性与质量管控”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完全合法且必要的追问。在一个理想的招呼式互动中，这些追问恰恰正是本真他者——物质的自然法则、确保使用者安全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发出的抵抗性回响。面对这些回响，一个有创造力的设计团队会将它们视为真正的研发驱动力，去设计新的材料配比实验、探索新的施工监控流程，或在规范的字里行间寻找等效安全的论证空间。

然而，在灾后重建紧迫的时间压力和严格的责任追溯体制下，一个关键性的语言转译发生了。那些本来是“回呼”的追问，在被向上汇报和向下传达的过程中，被逐渐缩减为一种终极的、毫无对话余地的否决性力量——“万一出事，谁签字？”这个被极大放大的职业追责风险，成为了一个替代性的他者。它发出了一个极其清晰、压倒一切的信号：“别碰它。”而与此同时，一条完全由已被既存规范验证过的技术路径构成的替代方案——采用完全成熟的预制板房体系——早已摊在桌上。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规范体系的行动者们并非在恶意地扼杀创新；他们只是在忠实地履行其作为系统性他者的职能——用一套完全闭合的、零风险的绩效语言来评估方案的“可行性”。那个本真他者——需要通过长期、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场试验来逐步理解和驯化的、由碎砖与秸秆构成的复合材料——在与这个系统性他者的遭遇中，被替换为一张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出现在法庭上的责任认定书。招呼的回路，在此被短路。

第三位替换者，是重建管理中的效率数字体系。在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灾后重建中，资金的拨付节奏、工期的政治考核与政绩的最终评估，都高度依赖于一套标准化、可加总的计量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唯一有发言权的其他者，就是可以被精确统计和展示的数字——安置户数、竣工面积、资金执行率、工程优良率。这套数字系统构筑了一个完美自治的反馈闭环：它从不反驳，从不抵抗，只是持续地、精确地在报表上反馈着“进度正常”或“进度亮红灯”。这个闭环的运作如此高度有效，以至于任何无法被这套数字语言即时表达的价值——例如，一个村镇的社群网络在共同制砖的漫长过程中被缓慢修复的程度，或者一个失去家园的个体在用手触摸到自制的砖块时所体验到的那种难以量化的主体力量恢复——都因为根本不具备进入此反馈流程的语法资格，而被彻底消声。决策者被精确而及时的数据所包围，却也因此被困在一个由进度表、Excel表格和审计清单构成的数字回音壁里。那个“灾民建造者”作为本真他者所携带的最核心的异质性——对以效率为唯一尺度的时间性的抵抗——在与这套数字系统的遭遇中，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表达与反馈渠道。

必须指出，上述的三重替换，很可能并非历史上依次发生的线性过程，更可能是三者同时交织、互相强化。本节基于现有文本材料的重演，其功能不在于复原历史的全部复杂性，而在于揭示“招呼回路被替换”这一发生学机制在建筑生产的真实场域中是如何运作的。一个可以进一步追究的、本文未能在此穷尽的问题是：当年实际参与了再生砖制作的那些灾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抱持着何种理解？如果田野调查揭示，他们更多地将此理解为“政府提供的一种省钱建材”而非“亲手缝合存在性创伤”，那么本文所描述的“建筑师发出的存在论招呼”，其本身就包含了建筑师对“本真他者”的一种投射——而这个投射本身的封闭性，或许正是招呼回路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建筑师在招呼一个他自己想象中的他者，而这个想象中的他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替换了那个真实地携带着其自身不可化约之复杂性的灾民。这一点，为未来的经验研究留下了一个真实的追问方向。

然而，无论那种更复杂的情形是否成立，本节所揭示的“三重替换”的发生学机制——在审美评论领域、工程规范领域和效率管理领域同时发生的“本真他者→系统性他者”的替换——仍然能够解释“再生砖”困境中最坚硬的那个内核：在一次世界级的巨大破坏之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原本提供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能够将建筑师、农民与物质废墟三方卷入深层对话的激进框架，就这样被三套安全、精密、高效的既有系统，在各自的边界上分解、消化并替换了。再生砖方案最终得以作为几个“示范性小建筑”和“文化展览项目”被保留下来，在专业媒体上持续收获赞誉，并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史讲述中的一个经典段落。然而，从“互蚀的招呼”的视角来看，这恰恰是招呼回路被中断后所能发生的最精致、最体面的一种悲剧性结局。再生砖作为一个被剥去了全部本真他者性的“美学符号”、一个被规范赦免于大规模应用之外的“试验例外”、一个在宏观重建叙事中被数字指标边缘化的“支线情节”，被安全地安置在了系统内部它所能占据的最佳位置。它以其残存的形式，反过来证明了系统是如何高效地工作，却再也没有可能以它最初所携带的全部异质性去持续逼问整个重建体系，迫使这套体系在与它沉重的对抗中，发生哪怕一次真正的结构跃迁。

五、回声的饥渴：个体为何主动拥抱独白

系统层面的他者替换与招呼短路，如果不能落实到个体的经验动态层面并解释一个更深层的现象，就仍然只是一张宏观的结构分析图，却无法回答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身处此系统中的建筑师们，往往不是愤怒地抵抗这种替换，而是在焦虑和疲惫中，主动地、甚至迫不及待地投入那个能给他清晰、安全和“专业”回应的符号系统的怀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入一种对建筑师日常经验的现象学式描述。以下对一位化名为M的青年建筑师的典型工作日的重构，基于作者对多家国内大型设计机构日常运作的田野观察与对十余位从业者的非正式深度访谈，文中所涉具体项目与对话均经过匿名化处理与情境重构，不指向任何真实个体或单一项目。

M在他那被项目节点、甲方电话和跨部门协调会填满的白天里，经历的并非简单的“劳动异化”——即他的劳动成果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他相对立。他经历的是一种更为隐蔽且更为根本的“关系剥夺”：他所有指向外部世界、试图与之发生创造性摩擦的、充满试探与不确定性的招呼，都在他尚未将其完整发出的时刻，就被一套极其高效、极其职业化的执行系统提前拦截，并将一份不容分说的“正确解法”塞回他的手中。

当他站在那个复杂的商业综合体项目中，面对一块巨大的、面向城市主要转角的幕墙时，他内心酝酿的招呼原本是这样的：“在这座南方城市闷热而多雨的黄昏，一栋商业建筑的表皮，能否以某种特定的物质感——或许是某种特定密度的粗糙，某种能挂住雨水的凹陷，某种在灯光下会呼吸的节律——来回应这条街道十米宽的人行道上，放学后涌出校门的孩子们奔跑时的身体尺度？”这个招呼是试探性的、向着一片具体现实发出的。它能听见的回呼，本该是那片现实的抵抗、启发与不期然的馈赠——比如，关于某种特定粗糙度的实际触感是否真的能与儿童的奔跑尺度发生共振，或者，某种看似诗意的节律在真实的城市噪音环境中是否完全失效。然而，这份招呼甚至没有机会在空气里存留。因为这套高效的协作系统——其硬件是项目管理软件、效果图公司排期和甲方的决策习惯——立刻以一种“高效的误读”回应了他。他收到的指令是：“就这个转角幕墙，石材分割出三版效果图明天中午前给甲方看，一版均匀分割，一版随机宽窄，一版竖向拉槽。”这就是系统提供给他的“回呼”。它不是一次对话的开启，而是一道工序的下达。他的招呼——一种朝向未知的、期待着自己也被改变的探寻——被系统当作一次对任务指令的请求来处理，并且立刻心满意足地交还给他一个精确的作业单。招呼的回路，在此刻被一根仅仅用于传输指令的独白管道所取代。

当结构工程师和消防顾问介入，要求他必须为地下商业加宽某部疏散楼梯时，他在同样短暂的一瞬间里，或许捕捉到了一丝微弱的兴奋：这个加宽的要求，是否可以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数据，而是成为一个重新组织地下一层公共空间序列与动线的机会？也许，一部被加宽到不寻常尺度的楼梯，可以不再是单纯的疏散构件，而成为一个垂直方向上的小型市民广场？他发出一份招呼的可能性再次浮现。但系统那更为强大、更为不容置辩的声音立刻盖过了一切：“不满足此条，不能通过内审。”这不是来自一个具体工程师的冷漠回答，而是一个由消防安全法规、公司内控流程和注册建

筑师职业责任共同构成的系统性他者所发出的终极裁决。这个他者的回呼是极其高效、极其清晰的，但它只回应数字（宽度、米数、百人指标），而不回应任何关于“空间契机”的试探。更精确地说，它没有“不回应”——它回应了，而且回应得完全正确。但这个正确的回应——修改疏散宽度以满足规范，然后继续按原方案推进——本身就将“楼梯可以成为一个市民广场”这个尚未成形的招呼，无声地关闭了。招呼的对象再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会从单一维度作出“通过”或“不通过”判决的执行程序。

日复一日，这类事件在M的工作中堆积，构成了一种他难以言说、却又无法逃脱的伤害。这种伤害的本质，并非他的创造性“被否定”了。否定本身是一种有内容的回应——它至少确认了他的招呼被听到了，甚至可能激发出更强有力的辩解和捍卫。真正的伤害在于，他的招呼并非被否定，而是被系统地不应。他从外部的、由规范、甲方和流程构成的庞大系统中，听不到任何能与他那微弱的、试探性的、试图触碰真实世界的呼唤相对应的回响。他听到的，只有一套对他那些可以被明确表达的“B类问题”——“应该做哪三版？”“需要加宽多少？”“车位数如何补回？”——所作出的完美回应。

这里是痛苦与成瘾的源头。人需要从外部世界听到回响，正如肺需要空气。这是主体性赖以构成的根本机制。当指向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可能遭遇失败但也可能被意外馈赠的“探索性招呼”，被系统性地掐灭于无形，而主体又因存在性的焦虑而急需从外界获得某种确认其在场与效能的“回响”时，一种自我保护的变形便发生了。他转而学习用系统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来发出“伪招呼”。那些关于“做哪三个版本比选”或“材料样板何时确认”的提问，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超越既有框架的探寻。它们是对回应姿态的恳求——恳求系统至少运转一次，用它的确认性回响（“方案已发送”、“节点已闭合”、“意见已落实”），来短暂地填补那个因本真他者缺席而造成的巨大回响真空。系统则热切地回应这些恳求，因为这套协作系统本身就是一架为高效处理此类可计算的问题而设计的精妙机器。于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伪招呼”与“伪回响”的无缝对接——作为“招呼—回呼”关系锈死的代偿机制，被建立了起来。它极其平滑，极其高效。它让项目得以推进，甲乙双方关系得以维系，职业绩效得以达标。但它的每一次成功运转，都在更深地锈死M发出那种真正的、携带着存在性风险的、朝向不可预判的他者的原初招呼的能力。他正在自己精湛的职业表演中，逐渐丧失触及真实的能力。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M在深夜打开他那个精心保存了五年的微型文化建筑的个人课题文件夹时，会感到一种弥漫全身的无力感。那不再是因为懒惰或才华的耗竭。他面对的那个“课题”，已经不是一个能与他在摩擦中相互发现的活的对峙。他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从“伪回响”中获得安全感，以至于当他面对一片虚空——一片需要他从头开始召唤出本真他者（场地、使用者、材料）并耐心聆听其低语的寂静之地时，他的招呼肌肉已经萎缩了。他试图向它发出追问，期待它像一片真实的、错综复杂的街角那样回呼他，给他制造困难，逼他做出取舍。但那个被他从密集的现实地层中抽象出来、封存在电脑文件夹里的“课题”，只是一个永远不会抵抗他、也永远不会给他带来意外启示的观

念。虚空是无法回响的。他在那五毫米的材料收口细节调整中，寻找的不仅仅是一个更优的美学解答，而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能与他对抗的反对者。他真正面临的，不是灵感的枯竭，而是关系性本身的真空。

六、被正确的“回应”所窒息的“招呼”：系统机制的微观解剖

个体的招呼能力锈死，并非一个孤立的主观心理事件。它与弥漫于整个专业场域内的一套精妙的微观运转机制互为表里。这套系统机制的真正效力，不在于它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恰恰在于，它几乎总能给出“正确的”、“负责的”、甚至“带着善意的回应”。正是这种技术层面的无可指摘，使得人们极易忽视一个更深的事实：这些正确的回应本身，正在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协作中，系统性地窒息另一种更为根本却无法自我辩护的东西——那不可计算的、携带着风险、试图撬开未知领域的首创性“招呼”。

让我们设想一个在设计机构的方案评审会上反复上演的典型场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被某个真实的场地或社会议题所触动，在既有的类型学工具箱中找不到完全趁手的解法，经过数周挣扎，做了一个结构逻辑大胆但与常规“深化范式”迥异的方案。他的汇报，磕磕绊绊，充满了感觉性的语言和难以量化的直觉。他在努力做着一次试探性的招呼——不仅是在与在座的专家们沟通，更是试图通过他们专业的耳朵，来确认自己捕捉到的那个来自场地或使用者的、尚不清晰的回响是否真实。

环坐在桌旁的专业者们——结构总工、消防顾问、甲方成本代表、资深方案总监——他们每个人在其各自的专业世界里都训练有素且忠于职守。他们所准备提出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其职责范围内完全正确、负责且极其合理的回应。

结构总工率先发话。在仔细研究了那张异形结构的草图后，他诚恳地问：“你这个钢结构在河面之上的长期防锈和未来的可维护性，打算怎么做？这和我三十多年来审查过的所有成熟做法都不一样。如果没有可靠的加速锈蚀实验数据或同等级别的已建成项目的长期跟踪记录，我这一关没办法给你签。”这个回应，从一个将毕生经验用于守护公共安全的老工程师口中问出，是完全正确的。它有效地回应了方案中一个真实的技术风险敞口。然而，它也是对一个更深层的招呼的拦截与替换。这位年轻的建筑师试图通过这种大胆的结构形式来招呼的，是一种建筑体量在河面上近乎漂浮的、令人心旌摇曳的轻盈感，是一种新的、尚未被结构理性完全驯化的诗意的显现。这个招呼是模糊的、处在精确的结构语言边缘的。而结构总工所能回应的，只能是他专业视野内那个清晰的、可被计算的“风险”。他的回应，就其本身而言无可指摘，但在那个具体的创造性碰撞的时刻，它用一个关于“如何让一个事物安全地存在”的正确回应，堵住了一个关于“一个事物是否可以以另一种未曾有过的方式去存在”的征询。这就是“语言转译—问题闭合”的微观现场：招呼尚未被充分展开，就被翻译为风险语言，并在“无法签字”处被闭合。

紧接着，甲方成本代表从他那本厚厚的概算清单中抬起头来，语气同样坦诚而无可辩驳：“你这个形式的建造成本，比我们地块出让条件里约定的常规立面造价，预估高出至少30%。如果按这个方案往下推，你必须能向我的汇报链证明，这多花的30%能为未来的城市和使用者的使用者提供何种额外的、可被衡量或至少被广泛感知的公共价值。你有这方面的量化数据或对标案例吗？”这个问题，从一个拿着有限预算、需要对董事会和公众负责的成本管理者口中问出，是完全正确的。它回应的是资源配置中最基本的伦理问题。然而，它同样无法回应，甚至从根本上就排斥回应该方案所试图发出的那份招呼。那份招呼正在试图召唤一种尚未被市场充分“定价”的新的公共价值——也许是河岸景观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标志性节点，也许是为市民提供一种全新的与水共处的方式。这种价值在它被建出来并被大量体验之前，在定义上就无法用任何成本效益分析的语言来证明自身的“物有所值”。成本代表用一个关于“如何在既有价值体系内证明自己合乎理性”的正确、负责、负责的回应，在无意之中，关上了一个通往可能彻底重新定义“此地的价值由何构成”的探索之门。

如果我们把真实的建筑设计过程想象为一场多方参与的、复杂的对话剧，那么上述这两位专业人士所代表的角色，并非偶尔出现的“反派”。他们充当着一个由职业责任、行业规范和风险规避逻辑共同编织的对话闸门系统的角色。这个系统并不会以粗暴的行政命令去压制创新。相反，它通过允诺一种更流畅、更安全、更可预期的进程，引导着一切对话都滑入它能够高效处理的“回应”频道。当这些“正确的回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无数评审会、协调邮件和意见征询表上累积，它们便逐渐内化为建筑师自身职业判断的一部分。那个一开始看起来外在的、令人沮丧的闸门，最终变成了设计者自己头脑里一个无意识的前置过滤系统。在他下一次提笔构思之前，结构老总关于“常规做法”的忧虑和成本代表关于“30%溢价”的质疑，已经作为“不切实际”的预感，抢先一步掐灭了他自己脑中可能萌发的、更为大胆的造型或材料试验。这是一种比任何直接的权力压制都更为彻底的规训，因为它最终呈现为一种自觉的、高效的、为项目推进扫清障碍的“职业素养”。然而，恰恰是这种被所有人衷心认可的专业性，当它作为一个整体无意识地运作时，却构成了一张绵密而无形的过滤网。这张网筛掉的，正是那些在初始状态总是脆弱的、笨拙的、无法用现有职业语言为自己高效辩护的、却恰恰是真正的创造所必须首先发出的——朝向本真他者的招呼。

七、制度化的回风：识别招呼回路的断裂与保护招呼回路的实践

一个理论诊断若要避免沦为一句聪明的学术感叹，就必须具备将其核心洞见转化为可被他人重复使用的分析工具的能力。同时，它也必须经验的层面上表明，它所诊断的那个困境，并非一张密不透风的宿命之网——在某些条件、某些制度安排下，招呼回路是可以被保护、甚至被主动维系的。本节并行完成这两件事：前半部分提供一个用于识别招呼回路断裂形态的分析框架；后半部分通过一个正例，初步探讨制度化保护招呼回路的可能条件。

（一）识别招呼回路的断裂形态：一个分析框架

下述框架并非一个可以被机械套用的“诊断尺”，而是一组需要研究者在与具体案例的持续摩擦中不断调整其焦距的追问方向。它的目标，不是给某个方案贴上“招呼三级锈死”的标签，而是引导分析者去追踪那个断裂究竟发生在哪里、由何种机制触发，以及它在那个具体案例中留下了何种痕迹。

第一，辨位的困难：在项目的起点，识别那个本真他者。这需要研究者追问：在这个项目特殊条件的集合里，谁是那个如果创作者真心诚意地去面对、就最有可能迫使他改变自己某些根深蒂固的设计观念和操作方式的存在？本真他者绝不会是泛泛的“甲方”或“用户”，它必须是一个足够具体、携带着明确抵抗性的实体。它可能是一片有着陡峭高差、特殊风向和棘手植被的场地；可能是一种其物理特性和传统工艺逻辑完全在建筑师既有知识框架之外的材料；也可能是一群其日常生活的空间使用方式、社群规则与意义系统构成了一套与建筑师现代生活经验迥异的逻辑的住民。辨位的核心困难在于：本真他者往往不会主动标出自己；研究者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理论范畴去“认出”一个熟悉的他者。而真正的辨位，恰恰要求研究者悬置那些熟悉的范畴，去诚实地辨认——在这个项目中，那个让设计者在直觉上感到棘手、无法用熟练套路应付的“硬核”，究竟在哪里？

第二，检核中的常犯错误：区分“回呼”与“回应”。拿到项目从概念到建成的全部过程记录（会议纪要、往来邮件、设计修改日志、各阶段评审意见），仔细将每一次外部输入进行分类。一类是“回呼”：本真他者发出的、超出了设计者原有认知预期和技能舒适区的、需要设计者发生某种结构性变形才能消化和应对的信息。这类回呼通常会让创作者感到一刹那的“卡住”、“意外”或“被挑战”。另一类是“回应”：系统性他者（或更糟，完全被符码化的赝品他者）发出的、可被设计者用既有知识和操作流程直接消化、解答和执行的信息，如“需要三个比选方案”、“成本超了”、“规范那条过不了”。检核中最常见的错误，是将某一次激烈的B类交锋误认为A类事件——比如，被甲方成本代表骂了一顿，觉得被挑战了，但那个挑战的实质内容完全在可预判的绩效框架之内。真正的回呼是那种让你在认知上感到“不对——但我说不清哪里不对”的信息，它迫使你回头去检查自己整个提问的方式。

第三，追迹的耐心：对“回呼”的命运进行发生学追踪。对于那些珍贵的、被识别出来的A类“回呼”，不能满足于记录它的出现，而是要沿着时间线向下游追迹：它在进入协作网络（与结构、空调、预算、甲方决策等其他系统的对话）之后，发生了什么？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触发了新一轮的“招呼—回呼”链——比如，那个来自场地坡度的棘手回呼，促使建筑师主动招呼了结构工程师，共同发展出一种新的基础与空间结合的方式？还是说，它在一个特定的节点上，被一次完全“正确”的B类追问所温和地、不可辩驳地终结了——例如，它被一句“这个想法很好，但会导致工期延长两个月，先放一放”搁置，并在随后的推进中再无下文。那个终结性的“正确回应”发生的具体情境——谁说的、在什么权限下、以什么语言转译——就是招呼回路在组织结构层面发生断裂的“第一现场”。追踪这一步，能将分析从抽象控诉推进到具体机制的指认。

第四，裁决的审慎：综合判定此案例中招呼回路的断裂形态。在上述三步的基础上，对个案做出整体定性。一个健康的、经历了充分“招呼—回呼”过程的建筑，其最终成果通常会带有某种令设计者本人也感到一丝“陌生”的特质。在那里面，沉淀着一些当初在招呼之始完全未曾预见、却被他者在回呼中馈赠的元素。它们构成了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的、不可被简单复制的部分。相反，一个经历了招呼回路断裂的设计，其成果——无论它多么精准、高效、圆满——会让经验丰富的评论者感到一种全然的“可控感”。设计者可以逻辑严密、滴水不漏地解释为什么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的，但整个作品始终缺乏那种仿佛来自外界、由一种更强大的不可控力量介入后留下的深刻张力。那种张力，正是本真他者曾真实在场并留下印记的唯一证据。

（二）制度化保护招呼回路的可能条件：一个思考方向

至此，一个最深层的实践性问题浮现出来：如果“向他者敞开”并非一个可以被建筑师随时自主启动的伦理姿态——因为连辨别本真他者与赝品他者的感知能力本身，都已是招呼回路锈死的产物——那么，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招呼回路有可能被重新打开？

本文不试图在此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这需要远超本文篇幅的制度分析和实证研究——但可以作为思考的起点，讨论一个被反复观察到的正例。伦佐·皮亚诺工作室的创作文化，在许多项目记录与皮亚诺本人的自述中反复显现出一种清晰的组织智慧：在与一个强大的本真他者（如一片亟待保护的自然保护区、一个拥有独特传统营造技艺的岛民社群，或一位对自然采光有着偏执般要求的医生）相遇之初，团队会有意识地启动一个“受保护的实验期”。在这个时期内，常规的可行性追问和成本控制压力被暂时悬置一旁。整个团队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解决”这个他者提出的棘手要求，而是去“倾听”它，允许被他者的逻辑和抵抗把最初的设计原型冲击得七零八落，然后再在这些残骸中，与工程师、材料商和最终使用者共同寻找一个此前无人预见的新综合。

从“互蚀的招呼”的视角来看，这种工作方法的实质，是在一个庞大商业组织内部，为极其脆弱的“招呼—回呼”幼芽，人工开辟了一小块免受常规系统性他者的“正确回应”过早扑杀的受保护发育的飞地。这个制度设计的关键不在于“鼓励创新”的意愿，而在于：它在操作层面识别出了那些最易窒息招呼的常规程序节点（可行性评审、成本核验、进度考核），并在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有意识地、制度化地削减了这些节点上的系统性他者的裁决权限。这不是“保护创造者免受压力”，而是“在组织的保护下，刻意地将创造者暴露在一个尚未被驯化的本真他者的压力之下”——一种主动引入异质性刺激的制度设计。这恰恰是autoimmunity框架所无法解释的那个动作的方向性。

当然，“受保护的实验期”只是众多可能的制度设计之一，且其适用范围有着清晰的局限——并非所有项目都有条件承受一个漫长的不确定期。本文在此提出这个方向，并非为了提供一个成熟的方案，而是为了标明一个追问的起点：既然问题不在于个体态度而在于关系条件，那么实践的出路，就必须从“改变态度”的呼吁，转向“设计制度条件”的努力。什么样的评审流程改造，能够在方案的最初阶段为那些尚不能用绩效语言自我辩护的招呼保留对话席位？什么样的职业责任保险机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系统性他者所承受的追责压力，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创新方案时，不只是作为风险屏障，也能成为共同探索的伙伴？这些问题，不在本文的解答范围之内，但它们正是“互蚀的招呼”这一诊断所指明的、值得未来研究去开垦的实践论域。

八、反例、证伪与自我指涉：一个新概念的边界

任何提出一个新概念的理论尝试，若要超越个人直觉与修辞的领地，进入可被公共知识辩论检验的场域，就必须诚实地提前划定自己的失效边界。它必须有能力清晰地回答：在何种条件下，我将会被证明是错的。

在个体层面，本文的核心推理链条是：一个建筑师或一个设计团队，若其在长达十到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其主要工作环境被证实几乎完全由B类反馈——甲方指令、规范遵守、流程对接、市场调研——所构成，且能识别出的、有记录的、与一个强大的本真他者（特殊场地逻辑、陌生材料工艺、边缘社群生活）发生长期、深入对抗的招呼性实践基本阙如，那么，根据本文的理论，我们将会观察到其创造能力的持续弱化，其后期作品将难以出现根本性的格局突破。要证伪这条假设，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在建筑史中寻找确凿的反例：一个建筑师，其有材料可稽的职业生涯完全符合上述“在回音室中工作”的外部描述，然而，他却不可思议地在后期持续产出了被跨世代的专业同行公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拓了全新范式的作品。如果在建筑史上能找到数个这样的、能够经得起发生学检验的个案，那么本文关于“本真他者的真实回呼是持续突破性创造的发生学必需条件”这一核心主张，就必须被根本性地修正。

一个看似更直接的反驳来自建筑史本身：柯布西耶、路易·康、卡洛·斯卡帕——这些大师们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所面对的业主压力、规范限制和行业惯性，并不比今天更宽容。如果他们能在那种条件下发出招呼并得到回呼，为什么今天的建筑师不能？本文对此的初步回应是：历史上的规范压力与本文所诊断的“系统性他者对招呼回路的替换”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在前者那里，规范是作为一股对抗性的外力存在的，它抵抗建筑师，建筑师也抵抗它，正是在这种相互抵抗中，创造性的形式被逼出——这是一种充满了摩擦的“对抗性共生”。而在后者那里，绩效符号系统并非以对抗的方式运作，而是以替代的方式：它不是在抵抗建筑师的招呼，而是在建筑师发出招呼之前，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更安全、更高效、更“专业”的替代方案，并用它来填满整个对话空间。这不是暴政，而是诱惑。正是这种运作方式的差异——从“对抗”到“替代”——使得当下的招呼回路锈死具有了与历史上的规范压力不同的发生学机理。

当然，这一历史比较的充分论证需要更详实的史学证据支撑。本文在此给出的是一个有待展开的方向，而非一个已经坐实的结论。它本身构成了本文核心判断的一个内侧证伪条件：如果未来的建筑史研究能够有力地证明，二十世纪那些最伟大的建筑突破，其生成条件中同样充斥着与今日在发生学意义上同构的“他者替换”机制——而不仅仅是更严苛的规范压力——那么本文关于当代困境

之“历史特异性”的暗含主张，就要被修正。

在系统层面，本文给出一个可触发的、短期的证伪条件：如果对国内五家大型设计机构中，按照本文的定义处于典型的“伪招呼—伪回响”循环中的项目团队，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观察，发现其中至少有一个团队，在未经任何显著的系统环境改变（如特殊的甲方授权、独立的实验预算、免受常规评审程序约束的保护期）的前提下，从内部涌现出了一项被独立的专业同行公认为具有开拓性的设计突破，那么，本文关于系统机制对创造力的结构性压制这一核心判断，其因果权重就需要被重新评估和下调。这个条件是可以在相对短期内被实证检验的，因此是将理论交付给了可裁决的公共知识场域，而非让它高悬于一个几乎不可能被触发的苛刻条件之上，从而在事实上获得免疫。

最后，任何一个严肃的理论构架，都必须将自身的逻辑应用于自身。“互蚀的招呼”这个理论本身，是否会成为它的提出者在学术场域中制造的一个小型回音室？它是否在用“他者”、“招呼”、“回呼”这一系列新异的能指，在一个由善意的、拥有相似文化资本的学术同行构成的小圈子内，为作者换取一种“创新”的满足感，而从未向那个名为“混沌、矛盾且常常令人沮丧的真实建筑实践”的强大他者，发出一份有风险的、可能被反驳得体无完肤的招呼？

这种自噬的风险是概念先天携带着的，无法通过任何自我标榜来豁免。能够部分钳制这种风险的，只有一件微不足道的、需要持续用力的事情：本文所搭建的分析框架（第七节前半部分）能否被建筑评论者、设计研究者乃至一线执业的建筑师们，在他们的实际工作中使用起来——用它去解剖一个项目，去理解一个团队的困境，或去反思一次个人的创作阻滞。如果“互蚀的招呼”最终只在学术期刊的论文里被循环引用，成为一种精致的、仅供内部流通的批判话术，再也未能溢出文本去触碰那些图纸上的迟疑、工地上的争论和评审会上的沉默，那么它就无比悲哀又无比精确地，活成了它自己所批判的那个对象：一次极其流畅、在学术规范意义上完全“正确”的智力展演，却从未向那个它试图去照亮的世界，发出过一次真正勇敢的、敞开自身边界的招呼。

九、结论：在制度条件中重新发明招呼

经过上面的全部论证，本文的核心判断可以凝缩为如下一个简短的命题：当代建筑创新真正的困境，并非一个先在的创造性主体被外部力量所压制或消耗，而在于与主体共同构成创造冲动的那个本真他者，被一套完全可预判的绩效符号系统所构成的系统性他者替换，导致只有在双向的抵抗与激发中才能生成创造力的“招呼—回呼”关系发生系统性断裂。我们不缺少交互，恰恰相反，我们被淹没在交互的噪音里。但我们已极为匮乏那种能与一片沉默的现实、一种陌生的工艺、一群无法被轻易归类的使用者，发生深切、严肃、能够双向重塑的对抗性对话的能力。那个被他者真实回响所牵引、所激荡、所赋形的张力充盈的状态，才是所有真正开拓性创造得以发生的唯一关系性子宫。

这一诊断的实践含义，不能也不应被简化为一句伦理呼吁——“建筑师，请你们重新学会倾听”。如果本文的诊断成立，那么连“辨别本真他者与赝品他者”的感知能力本身，都可能是招呼回路锈死

的产物。因此，通往一个更富创造力的建筑文化的路径，其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个体态度的转变。它同样——或许更为根本地——依赖于一种制度性的努力：在专业协作系统的设计中，有意识地、制度化地为那些尚无法用任何既成绩效语言自我辩护的、与异质性现实之间的脆弱招呼，保留受保护的对话空间和存活的飞地。皮亚诺工作室的“受保护的实验期”只是一个初步的例子。什么样的评审程序改造、什么样的风险分担机制、什么样的建筑教育环节设计，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为招呼回路的重新接通创造条件——这些问题，本文未能回答，但它们是“互蚀的招呼”这一诊断所必须指向的未来工作方向。

在交出这份诊断的同时，本文必须诚实地承认它的不完备。本文对“制度条件”的讨论，只开了一个头，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分析。本文在案例部分对“再生砖”的重演，虽有文本依据，但仍缺少来自当年的灾民和一线管理者视角的经验材料，因此尚未触及那个真实历史现场的全部复杂性。本文所搭建的分析框架，仍需在更多的实际案例中经受检验、修正和被推翻的可能。这些不是客套的自谦，而是对理论自身边界的一次必要的标定。

本文的全部判断，将在以下清晰的条件下被证实为根本性错误：如果未来二十年，由那些最严谨、最深刻的建筑史家所撰写的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书中明确地写道，本世纪最初那几十年里最伟大的、改变了学科地貌的建筑突破，其中的绝大多数，恰恰诞生于那些对规范条文最严苛遵从、对建造成本最锱铢必较、对可行性追问最不留情面、且在其系统内部几乎完全找不到任何一块为实验性错误提供制度赦免之飞地的评价体系之中。届时，我们将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那种最深刻的创造力，的确是一座无需任何他者回风也能独自熊熊燃烧的火山。而本文，不过是记录了一场发生在特定历史瞬间的、关于一种特定关系形式之消亡的、短暂而错误的哀悼。

注释

[1] 本文所论“他者”概念借自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现象学传统，但进行了关键性拓展。在列维纳斯那里，他者以其面容向“我”发出无限的单向伦理召唤；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个在具体创造性实践中同样根本的双向结构——“招呼”（主体向他者发出的探索性呼唤）与“回呼”（他者以其抵抗与异质性做出的反向激发），并进一步区分了“本真他者”与“系统性他者”。详见第二节的相关讨论。

[2] 本部分对“再生砖”方案的发生学重演，主要依据刘家琨发表于《时代建筑》2009年第1期的《“再生砖”计划》一文（第86-91页），以及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提供的项目说明。文中所描绘的部分互动情境为基于文本逻辑的审慎理论重建，旨在揭示招呼回路断裂的发生学机制，并非对历史细节的严格复原。对于缺乏直接证据的推断性内容，正文均以“可能”、“可推断”等措辞标明。

[3] 本部分对化名为M的青年建筑师日常经验的现象学描述，系基于作者对国内多家大型建筑设计机构的田野工作观察，以及对十余位一线从业者的非正式深度访谈。为保护隐私并清晰呈现理论

要点，材料经过了匿名化处理、典型特征合成与情境简化。文中所涉具体项目、人物对话及内心活动均经过重构，不指向任何真实个体或单一项目，其功能是为随后的理论诊断提供一个可感知的经验锚点。

[4] 此正例讨论系基于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建筑实践中被广泛报道的一般性工作方法，而非对某一特定项目的实证分析。其功能在于初步指示制度化保护招呼回路的一个可能方向，并非作为已确立的经验论证。

[5] 本节所设计的个体与系统层面的证伪条件，以及末尾的自我指涉性检视，意在将“互蚀的招呼”概念交付公共知识辩论的检验，防止其滑向自身所批判的封闭独白。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要求。

参考文献

刘家琨. 2009. 《“再生砖”计划》. 《时代建筑》, (1): 86-91.

Boltanski, Luc, and Eve Chiapello. 1999.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

Christensen, Clayton M. 1997.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Esposito, Roberto. 2002. *Immunitas: Protezione e negazione della vita*. Torino: Einaudi.

Levinas, Emmanuel. 1961. *Totalité et Infini: Essai sur l'extériorité*. La Haye: Martinus Nijhoff.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